

肆、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考述

楊立志

(鄖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校長 教授 湖北省武當文化研究會會長)

內容摘要：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視玄天上帝為入主中原的肇基神和福國裕民的保護神，不僅建廟賜額，加封神號，還多次在武當山建醮祈福，告天祝壽，重視和扶持武當道教的發展，這進一步提高了玄天上帝的神格地位，擴大了玄帝信仰在全國的社會影響，為明代玄帝信仰的普及和武當道教的鼎盛奠定了基礎。考察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的史實，既有助於深入探究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的內在原因和外在表現，也有助於加深對元代武當道教發展狀況和社會政治現實的認識。

關鍵字：元皇室 玄天上帝 武當山 武當道教

元代是玄天上帝信仰和武當道教持續發展的重要時期，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視玄天上帝為入主中原的肇基神和福國裕民的保護神，不僅建廟賜額。加封神號，還多次在武當山建醮祈福，告天祝壽，重視和扶持武當道教的發展，這些舉措進一步提高了玄天上帝的神格地位，擴大了玄帝信仰在全國的社會影響，為明代玄帝信仰的普及和武當道教的鼎盛奠定了基礎。元皇室對玄天上帝的崇奉和對武當道教的扶持，對元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都產生了較大影響，這也是元史和中國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但近代以來對於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的史實卻缺乏專文論述。本文擬就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的原因、表現及其社會影響等問題略作探討，以期闡釋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的史實，從而加深對元代武當道教發展狀況和社會政治現實的認識。

一、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的原因

玄天上帝是道教崇奉的主神，又稱真武大帝，它來源於中國古代宗教中的玄武崇拜。玄武的起源與演變過程頗為複雜，大致經歷了從動物神、星宿神到人格神的不斷昇華。宋代以來，真武的神格地位逐漸提高，成為

官方與民間極為尊崇的道教大神。為了適應官方與民間的信仰需要，道士們結合五代以前玄武的神性特徵，不僅賦予玄武以人形外貌，而且還編撰了一套玄武神在武當山修煉得道、功成飛升的經傳，系統地記述了玄天上帝的身世、修道及其顯化、職司等內容，使玄帝故事趨於規範化和神聖化，營造了濃厚的社會氛圍。玄帝信仰的歷史淵源和濃厚氛圍，是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的社會文化背景，也為元皇室繼續崇奉玄天上帝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條件。客觀地說，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既有鮮明的歷史繼承性，也有現實的政治需要，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元皇室視玄天上帝為保佑元朝統一大業的肇基神，希望借神權以鞏固政權。儘管宋末元初江南民間流傳了一些不利於蒙元統治者的武當真武降筆，但元政府未必知道。相反，由於真武神是北方之神，具有司水和司北方的神性特徵，在民間影響極大，元皇室通過漢族士大夫和道士們的介紹，反而會愈加重視真武神。元揭傒斯〈大五龍靈應萬壽宮瑞應碑〉云：「世祖皇帝初營燕都（今北京），歲（1269年）十有二月，龜蛇見於高梁河之上。上召問諸儒臣，翰林學士承旨臣（郭）孝祺等曰：「國家受命朔方，上值虛危，其神玄武，其應龜蛇，其德惟水，水勝火，國家其盡有宋乎？此水德之徵應也」。詔即其地建大昭應宮以祠玄武。」「[1]蒙元是興起於北方的遊牧民族，為籠絡人心，緩和民族矛盾，採取了相容並蓄的宗教政策，對各種宗教一律加以支持和保護。忽必烈身邊的漢族儒臣對此很清楚。所以當高梁河出現龜蛇而皇帝召問時，他們就把這解釋成為「皇元之興實始於北方，北方之氣將王，故北方之神先降事以為兆，天既告之矣。[2]」進而又把這件事與正在進行的征服南宋的戰爭聯繫在一起，認為宋是火德，蒙古是北方的水德，「水勝火，國家其盡有宋乎？此水德之徵應也」。忽必烈對這種解釋欣然接受，他在至元八年（1271年）〈建國號詔〉中即宣稱：「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國，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土之廣，曆古所無。」[3]忽必烈的論調與郭孝祺等人的解釋庶幾相似，這充分說明他也想利用在民間影響極大的道教玄武神來籠絡控制民心，並為以後加強對江南地區的統治服務。忽必烈奉祀玄武神，視玄武神為自己入主中原的肇基神，這就為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奠定了信仰基礎。

第二，元皇室視玄天上帝為〈主天子壽命〉的司命神，希望神能護佑皇帝萬壽無疆。因玄武神有司命的職能，〈主天子壽命〉，故忽必烈在大都營建昭應宮時即有「神臨其間，壯帝之京，以永天子萬年之禎」[4]的目的。自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以後，元皇室更視玄天上帝為福國裕民的保護神，把武當山玄帝宮觀看作為皇帝「告天祝壽」的御用道場。究其原因，則是因玄帝耶誕節是三月初三，恰好元仁宗也出生在這一天，所以元仁宗對玄帝極為尊崇。「又道書相傳，其神三月三日降均之武當，天子萬壽節以其同，故歲遣祠官致祭」[5]。揭傒斯《大五龍靈應萬壽宮瑞應碑》云：「仁宗天壽節適與神所降辰同，歲遣使建金籙醮，祝以其山之五龍，後以為常。」[6]。也就是說，元仁宗以後的元朝皇帝，每年三月三日都要遣使致祭武當山玄天上帝，每逢他們自己的「天壽節」，也要遣祠官乘驛傳、奉御香到武當山建金籙大醮，為皇帝祝延聖壽。如元順帝至正二年（1342年）和至正九年（1349年）四月十七日，是順帝天壽節，皆遣使至武當山五龍宮設醮祝禧，郡縣皆有官吏陪同前往。甚至一年中要建四次金籙大醮，為皇帝祈福延壽，如荊襄道教都提點唐洞雲於延祐中奉詔，「遇天壽節乘傳函香，醮襄陽之武當。歲數四，率以為常」[7]。這實際成了元皇室的慣例，久行不衰。

第三，元皇室視玄天上帝為福國裕民的保護神，希望得到神的庇佑和拯救。道經說玄武是「治世福神」，能「分身降世，濟物度人，無邊無量」[8]。《太上說真武本傳妙經》載宋仁宗〈降真贊〉云：「……香火瞻敬，五福攸從」。任自垣《敕建大嶽太和山志》卷三〈玄帝紀〉云：「凡遇甲子、庚申，每月三、七日，下降人間，察人善惡、修學、功過，善福生靈，操扶社稷。玄帝奉詔後，千變萬化，為教主濟度人世，無量無邊，洞天福地，靈顯感應，簡冊難窮。潤澤普博，智德恢洪，無一時不念眾生，無一刻不憐下主，大慈普救無上法王也。」[9]元皇室為了祈福禳災，拯救民生等需要，對它非常信仰，虔誠供奉。元成宗加封玄帝詔書即云「拯濟民生而仁周宇宙，廓清世運而威暢風霆」。由是觀之，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還有希望玄武神「永垂庇佑，錫慶家邦」的政治意圖。

第四，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還與玄教宗師張留孫的活動有密切關係。張留孫，字師漢，信州貴溪人。至元十三年（1276年）南宋滅亡後，忽必烈召江西龍虎山第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赴大都，張留孫以善占卜而同行。次

年，張宗演返回龍虎山，張留孫仍留大都。後來，張留孫因為皇后、太子等人祈禱、治病、圓夢有驗，被加封上卿、賜寶劍。至元十五年(1278年)，又加授玄教宗師、道教都提點，總攝江北、淮東、淮西、荊襄道教事，佩銀印。張留孫一生歷經世祖、成宗、武宗、英宗四朝，備受寵遇，相繼被加封為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開府儀同三司、領集賢院事。武當山乃玄帝祖庭，又是玄教宗師管轄範圍內最重要的道教名山之一，因此張留孫對玄天上帝和武當道教特加重視，在任玄教宗師的第二年就改升五龍觀為宮，並極力向皇室推薦武當道士的法術，爭取皇帝對武當道教的支持。元揭傒斯《敕賜武當山大五龍靈應萬壽宮碑》云：「先大宗師、上卿張留孫初總攝江淮荊襄道教，奏以其山葉希真朝覲，入侍秘祠。天子大信其道。」據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記載，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葉希真「應詔赴闕，止風息霆，禱雨卻疾，悉皆稱旨，至元二十三年欽受聖旨，領都提點，任武當護持」。是書又稱：「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法師葉希真、劉道明、華洞真承應御前，充武當山都提點，奏奉護持聖旨，累降御香，祝願祈福。」[10]玄教宗師張留孫的積極活動，既使武當道教得到了元皇室的尊寵、優待和扶持，也進一步加深了元皇室對玄天上帝的崇信。

二、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的表現

元皇室自世祖忽必烈至順帝妥歡帖睦爾，皆崇奉玄天上帝，扶持武當道教，他們或加封神號、或修宮賜額、或遣使奉香建醮、或召高道禱雨卻疾，奉祀虔誠，尊禮隆盛。具體說來，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的表現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加封神號，提高玄武神的神格地位。據《元史》記載，大德七年(1303年)十二月，元成宗鐵穆耳「加封真武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11]。武當山原有大德八年立石的《大元敕封真武詔書碑》，據《玄天上帝啟聖靈異錄》校補，云：「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武當福地，久屬職方，靈應玄天，宜崇封典。騰言真武，昔護先朝，定都人馬之宮，嘗現龜蛇之瑞。雖昭應已修於明祀，而仙源未表於徽稱。爰命奉常，議行褒禮。謂元者善之長，聖德合於一元；聖則化而神，元功同於三聖。拯濟民生而仁周宇宙，廓清世運而威暢風霆。訂鴻名而既嘉，宜寵光而合忝。於戲，天道主宰謂之帝，四季庸鎮於山川。帝室眷命受於天，萬年永安乎宗社。思皇多祉，

佑我無疆。特加號曰玄天元聖仁威上帝。主者施行。」[12]關於這次封號的字序，《元史》和碑文雖然略有出入，但均以聖旨的名義確定真武的神格地位由「真君」上升為「天帝」，並直接把「武當福地」視為玄帝「仙源」之所在，這是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的一件大事，也是玄帝神格地位演變過程中的一件大事。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又封玄帝父母，加封其父為「啟元隆慶天君明真上帝」，加封其母為「慈寧玉德天后瓊真上仙」。泰定帝泰定二年(1325年)十二月，又封玄帝部將水火二神，加封水神為「靈濟將軍」，加封火神為「靈耀將軍」。在這些加封聖旨中，都反復強調玄武神「昔護先朝」、「開皇家之景運」，視玄天上帝為元皇室的保護神。

第二，修宮賜額，棲真妥神。至元六年(1269年)營建大都時，有龜蛇見於高梁河之上，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翰林學士承旨郭孝祺等人的解釋，認為這是玄武神顯靈，應兆蒙古將入主中原，「開萬世太平之基業」。忽必烈進而認為：「神聖能陰庇吾民，可不吉蠲祀享，以答靈貺乎？乃詔大其棟宇而為之宮。」[13]為了棲真妥神，更好地奉祀玄帝，忽必烈乃下令即其地建宮祀神。至元七年(1270年)九月宮成，該宮「重門宏敞，密殿深嚴，翬飛璿題，金采溢日，遂為京畿偉觀」[14]。忽必烈又賜名昭應宮，並命詞臣撰文刻碑大事宣傳。至元十年(1273年)十月，命太一教五祖李居壽「奉安真武神位於昭應新宮，禮畢，中宮衣以異質凌道服」[15]。令女官道士嚴奉住持，以彰神應之靈。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世祖又下詔正式升武當山五龍靈應觀為五龍靈應宮，以高道葉希真為住持，看守仙山，護衛玄帝祖庭。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冬十月，應集賢大學士陳灝之請，愛育黎拔力八達加賜武當山南岩宮為「大天一真慶萬壽宮」，後又加賜武當山五龍靈應宮為「大五龍靈應萬壽宮」，並命詞臣撰碑刻石。紫霄宮也被加賜為「大紫霄元聖萬壽宮」。由於有了元皇室的青睞，南岩宮、五龍宮和紫霄宮遂成為元代武當山最為主要的玄帝宮殿，這裏不僅殿宇巍峨，像設端嚴，而且還是各種道教法事活動的中心和民眾朝山進香的聖地。

第三，建醮祈福，祝延聖壽。武當福地乃玄帝祖庭，威靈顯著，元世祖忽必烈時就曾多次降御香命武當道士為皇帝祈福祝壽，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因天壽節與玄帝聖誕同日，故每年都要在武當山各大宮觀建金籙大醮，祝延聖壽。元英宗碩德八剌是仁宗親子，他繼位後也經常遣使到武當

山建醮祝禧。如至治元年(1321年)冬，總攝道教所掌書記唐洞雲奉英宗命齎香到武當山及江陵玄妙觀祝禧。次年二月春，「馳驛至武當山，次至玄妙觀建大齋醮，以殫報上之誠」[16]。文宗天曆二年(1329年)十一月，「明宗後八不沙清為明宗資冥福，命道士建醮於玉泉、太乙、天寶、萬壽四宮及武當、龍虎二山」[17]。明宗是文宗同母異父的兄長，天曆二年正月在漠北即位，八月「暴崩」於回歸大都途中，史家認為是文宗將他毒死的，而明宗後在悲憤之際仍不忘在武當等地為明宗建醮祈「冥福」。元順帝妥歡帖睦爾即位後，更是頻繁地在武當山建醮祈福，並多次宣揚「瑞應」的出現。如至正九年(1349年)「天壽節，法師張淵亮奉詔馳香，偕奉議大夫襄陽路同知荀顏帖木兒、忠翊校尉均州同知李從古恭詣敕賜大天一真慶萬壽宮，肅致聖天子明德之聲，祝延惟謹。最高處大頂銅殿以奉祀事，登其上鞠躬竭虔，效華封人祝，忽五色毫相光見，炯炯焰焰，光奪人目，眾皆瞻異，以為嘉禎」[18]。元順帝至正時期，元朝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的境地，因此元皇室更希望得到武當山玄天上帝的庇佑，以安撫人心，緩解緊張局勢。

第四，重用武當道士，扶持武當道教。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視玄武神為自己的保護神，作為玄帝祖庭的武當山自然也備受關注，再加上玄教宗師張留孫的積極引薦，武當道人屢受元皇室的恩寵，武當山的地位也與日俱增，武當道教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據揭傒斯《大五龍靈應萬壽宮碑》和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記載，由於張留孫的推薦，武當道人葉希真得以朝覲天子，入侍秘祠，止風息霆，禱雨卻疾，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詔改其觀為五龍靈應宮，以希真主之」[19]。除了葉希真，武當道人劉道明、華洞真等也都曾承應御前，受到了忽必烈的優待。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皇太后答己聽聞武當山南岩宮道人張守清道行高深，遂「遣使命建金籙醮，征至闕」[20]，召請張守清入京為元武宗建金籙大醮以祈壽。元仁宗皇慶元年(1312年)春三月，京師乾旱缺雨，仁宗詔張守清建壇禱雨，張守清建壇祈雨，預報下雨日期時辰，「已而果雨，數日乃止，遠近皆沾足」[21]。皇慶二年春乾旱不雨，詔張守清禱而有雨；「夏又不雨，又禱又雨，既沾既渥，仍大有秋。兩宮大悅」[22]。於是加賜南岩宮為《大天一真慶萬壽宮》，加封張守清為《體玄妙應太和真人》。元仁宗在加封詔書中特別強調張守清「為老子

學，奉玄帝祠」。由於元皇室的支持，武當山的地位大有提高，官方文告正式稱之為「武當福地」。泰定帝泰定二年(1325年)七月，「遣使代祀龍虎、武當二山」[23]。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四月，「遣使以香幣賜武當、龍虎二山」[24]。在元皇室心目中，武當山已經成了與正一教本山——龍虎山齊名的道教聖地。為了更好地奉祀玄帝，元皇室對武當道教也大力扶持。元世祖忽必烈曾親命法師葉希真、劉道明、華洞真等充任武當山都提點，並降旨護持仙山。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三月，「免武當山新附軍徭賦」[25]。元泰定帝泰定二年(1325年)二月，「頒道經於天下名山宮觀」[26]，武當山亦享其榮。元順帝至元三年(1337年)，頒白話聖旨《戒臣下碑》，告誡軍官、軍士、使臣、官員人等一律不准在五龍宮住宿，並保護宮觀產業，免除各種差役、商稅、地稅等[27]。

三、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的影響

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扶持武當道教，既提升了玄武神的神格，擴大了玄武神在全國範圍內的社會影響，也抬高了武當山的地位，促進了武當道教的發展，為明代玄帝信仰的普及和武當道教的鼎盛奠定了基礎。概而言之，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提升了玄武神的神格，擴大了玄天上帝的影響。玄天上帝是武當道教崇奉的主神，但並非一開始就貴為天帝，而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宋代以來，由於宋真宗、宋仁宗、宋徽宗、宋欽宗、宋甯宗、宋理宗等相繼加封玄武，增上尊號，玄武的神格地位才逐漸提升，成為官方與民間極為尊崇的道教大神。宋理宗時，玄武的封號就已達十八字之多，但終宋一代玄武正式的神格封號並未突破「真君」系列。直到元代，真武真君才正式被元皇室加封為「玄天上帝」。大德七年(1303年)十二月，元成宗鐵穆耳敕封真武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這次加封，標誌著玄武的神格地位正式由「真君」上升為「天帝」，完成了玄帝神格地位演變過程中的一次跨越。受這次加封的鼓勵，武當山道士米道興、王道一用不到四年時間，在武昌、長沙、杭州等地募集資金，鑄造了中國第一個玄帝銅殿。隨著玄帝神格地位的提升，玄帝父母及其部將水火二神也先後受到了元皇室的崇封。每一次崇封，元皇室都會命詞臣撰文刻碑，大事宣揚，以彰顯奉祀之虔誠和尊禮之隆盛。除了高規格的崇封玄武，元皇室還在京師大都和玄帝祖庭武當山修宮賜額、建醮祈福，並大張旗鼓地宣揚玄武神的

種種靈應事蹟。如至元七年(1270年)九月大都昭應宮落成，元世祖忽必烈就命近臣徐世隆、王磐、魏初等分別撰碑記其事，詳述了營建昭應宮的緣起和用意，表達了奉祀玄武以答靈貺的虔敬之心。元代雖享國不足百年，但疆域空前廣大，元皇室持續不斷地崇奉玄天上帝，反復渲染玄武神的神異靈應，這進一步強化了玄天上帝在普通民眾中的神聖地位，擴大了玄天上帝在全國範圍內的社會影響，為明代玄帝信仰的普及奠定了基礎。

第二，抬高了武當山的地位，促進了武當道教的發展。唐宋以前，武當山的地位並不十分顯赫，「彼夫禪主絡繹者七十二，柴望之禮稱嶽稱鎮者各五，而茲山固泯泯也」[28]。在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編撰的《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中，武當山也只被列為七十二福地之一。而到了元代，由於得到了元皇室的支持，武當山的地位大有提高，不僅官方文告正式稱之為《武當福地》，元皇室還多次遣使代祀武當、龍虎二山，視武當山為與正一教本山——龍虎山齊名的道教聖地，這極大地抬高了武當山在天下名山中的地位。元皇室既崇重武當山，還積極扶持武當道教的發展。在玄教宗師張留孫的積極引薦下，武當道人屢受皇室恩寵，葉希真、張守清等都曾入宮朝覲，承應御前，深得元皇室的信任，他們或卻疾有功，或禱雨有應，既凸顯了武當山的靈驗，也加深了元皇室對武當道教的倚重。元代的武當山，也因此成了為元皇室《告天祝壽》的御用道場，元皇室曾多次降旨，護持仙山，並敕封宮額，提高武當道教的聲譽。元順帝至正三年(1337年)，還頒發聖旨，保護武當道教的宮觀產業，免除各種差役雜稅，使武當道人專心辦道，為皇室祈福。元代武當道教憑藉著皇室的庇護，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迅速改變了宋末元初因三罹劫火而凋零殘破的衰微局面，宮觀建築、常住產業和教團規模都有了長足發展，形成了以張守清為首的新武當派。張守清不僅致力於修宮建廟，使武當宮觀的數量急劇增加，規模日益宏大，而且廣收門徒，編刊道書，壯大了武當道教的教團組織，擴大了武當道教的社會影響。張守清還因元皇室的恩寵而多次入京，與虞集、趙孟頫等許多著名文人交遊頻繁，往來唱和，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影響。這些既促進了元代武當進香民俗的發展，也為明代武當道教的鼎盛奠定了基礎。

綜上所述，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扶持武當道教，視玄天上帝為「錫慶家邦」的保護神，視武當山為「告天祝壽」的御用道場，這不僅擴大了

玄天上帝在全國範圍內的社會影響，也促進了武當道教的迅猛發展，為明代玄帝信仰的普及和武當道教的鼎盛奠定了基礎。元皇室對玄天上帝的虔誠奉祀和對武當道教的特殊禮遇，其根本目的雖然還是為維護元王朝的封建統治服務，為滿足自身的各種實際需要服務，但這在客觀上既對元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產生了較大影響，也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武當道教文化的內涵，為我們研究元史和中國道教史拓寬了視閥，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間和新的研究思路。

注釋：

[1][6][9][14][18][19][20]任自垣：《敕建大嶽太和山志》，楊立志點校：《明代武當山志二種》，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2][4][11][12][13][22]徐世隆：《玄天上帝啟聖靈異錄》，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30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

[3][17][23][24][25][26]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8]《玄天上帝啟聖錄》，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30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

[5][7][15][16]陳垣編，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7年。

[10]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48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

[21]趙孟頫《松雪齋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

[27]張華鵬等編《武當山金石錄（第一冊）》，湖北省丹江口市文化局，1990年。

[28]盧重華：《大嶽太和山志》，楊立志點校：《明代武當山志二種》，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